

中國社科學術期刊40年發展的結構分析

李 頻

[提 要] 文章以“學術期刊—學術規範—學術共同體—政府”四維張力關係審視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40年歷程及特點。1998年設置高校學報刊號系列，1999年推行CAJ-CD規範是改寫學術期刊史的焦點時刻，前者影響了知名高校社科學報的做大做強，後者逆轉了學術評價的初衷和方向。學術集刊維護了學術期刊的生態平衡，總體生態價值高於思想學術價值。名刊工程理念先進卻未竣工，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行動更顯學術期刊規律意義。

[關鍵詞] 學術集刊 高校學報 學術規範化運動 學術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39.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098 - 13

在改革開放的視域中審視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 40 年的變遷，不僅關乎學術期刊與改革開放歷史關係的認識，而且有助於認識當下以及未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傳播的體制建構和機制轉換。本文標題中所說的“結構”指要素及其關係，以改革開放為背景，選擇學術集刊、高校社科學報、學術規範化運動、名刊工程作為觀察點，揭示其中隱含的學術期刊與學術共同體、政府管理的媒介關係，從而解釋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 40 年來複雜多變的演進邏輯，以豐富對改革開放學術期刊歷史的認識。

一、學術集刊：生態平衡與期刊鏡像

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通常以其主辦單位分為三種類型：高校社科學報、社科院（含社科聯系統）主辦的學術期刊、黨政幹部院校主辦的學報。40 年間一直另外潛滋暗長著被稱為學術集刊的類群，在出版許可上“以書代刊”，形態上符合國際通行的連續出版物。各個集刊存續時間有長有短，學術價值有高低差異，累積數百種的規模使其成為不容忽視的歷史存在。十餘年來，已有不少研究者視如學術期刊現象撰文討論。本文認為，這四類期刊合成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整體。它們互為“鏡子”，映現其功能預設、內容範圍、服務群體等方面的特徵與差異。在學術生態視野下觀照、反思它們的個性特徵與功能互補，是改革開放學術期刊史的基本論題，正如這四類期刊的實踐交叉點和理論焦點集中指向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生產機制，那是改革開放學術期刊史的核心。

（一）時段特徵與生態平衡價值

學術集刊，用出版管理行話是“以書代刊”，它伴隨了改革開放期刊史的始終。改革開放期刊史乃至出版史上最早實施以書代刊策略的是1978年《十月》創刊。^①“集刊”用作連續出版物名稱是1979年創刊的《外國哲學史研究集刊》、《外國文學研究集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外國哲學史研究集刊》是不定期出版的外國哲學史刊物，第一輯的中心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有王若水、賀麟、陳元暉、陳啟偉、葉秀山、楊一之、汝信、王樹人、余麗嫦和薛華等論述黑格爾、康德、費爾巴哈的文章，此外有讀書劄記一篇。本《集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研究室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②《外國文學研究集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刊以提高外國文學研究水平為目標，是解放後我國外國文學研究方面的專門的學術性集刊，主要刊載該所研究人員的學術論文，同時也吸收所外專家、學者的稿件。”^③1980年1月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封三刊登了《外國文學研究集刊》創刊刊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第一輯”要目。這批最早的集刊有三個鮮明特徵：其一，編輯與出版分離：社科院的所、室負責集刊內容編輯，京內或京外出版社負責集刊出版；其二，集刊編輯是學術組織的機構行為，十幾年後才演變為自組織的學術共同體行為；其三，集刊內容專業專門。追溯及此，意在強調，學術集刊由來已久，非1990年代才有。據載，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複印報刊資料》“選材的範圍，1984年有1,400多種報刊，另外還新增選新華書店發行的叢刊書和彙編書中的文章，至1985年，兩者之和共有1,700餘種”。^④這裡的“叢刊書”即學術集刊。

學術集刊近40年的發展以1991年《學人》創刊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此後學術集刊長足發展且深入影響學界社會。《學人》的期刊史“拐點”意義在於自組織學術集刊示範公共學術空間。《學人》主編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並非所在單位或相關組織任命決定。這構成改革開放期刊史上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引致眾人效仿——在獲得必要的辦刊經費支持後，個體以志趣情懷相投，自組團隊，自編學刊，謀求出版。1992年國家啟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振奮了知識界，2001年中國加入WTO拓展了知識界思想與行動空間，這兩個社會環境因素也積極有效地催生了學術集刊量增質高。有人統計，截至2005年8月，全國已出版人文社科學術集刊331種，2009年2月達456種，“大約是同期哲學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數量（2,456種）的18.6%”。^⑤種群顯著使其成為學界、期刊業均難以忽視的存在。據筆者2003年完成課題中的相關統計，《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自2000年創刊號至2003年第2期共出版20期，其中從23種學術集刊中選文56篇，佔1,077篇期刊文獻的5.2%，佔該20期286種期刊文獻源的8%，佔其所有337種文獻源的6.8%。《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前20期中選摘6篇以上論文的集刊分別是：《環球法律評論》（13篇）、《北大法律評論》（8篇）、《清華社會學評論》（6篇）、《中國學術》（6篇）。這些都顯示學術集刊值得關注的學術功能與地位。

2005年7月，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首次發佈了CSSCI（2005年度）來源集刊33種，可視如中國加入WTO後援用國際慣例對學術集刊的再次激勵，其正向意義不可低估。2017年1月發佈的2017～2018年度CSSCI來源集刊增加到189種。2010年，中國知網線上發行“中國學術輯刊全文數據庫”，滾動發展，收錄1979年至2017年7月的學術集刊689種。201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整合190餘種集刊數據庫的基礎上創建“中國集刊網”，而且每年組織召開“人文社會科學集刊年會”。默許的寬容意味著政府出版管制的進步。

相比高校學報和社科院、社科聯系統的學術期刊，學術集刊合法性頗顯尷尬，它因沒有刊號而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既然“灰色”，便難以資源富集、茂盛繁衍，只能靠自身頑強生存。它們一律是專業刊，顯示其專業理性賦予的合法性及學術潛力。

（二）《學人》：“學術史研究筆談”的拐點意義

《學人》創刊於1991年，停刊於2000年，共出版15輯，刊齡不長，影響不淺，堪稱學術集刊乃至學術期刊發展史上標誌性事件。該刊“得到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備委員會的資助”，是改革開放出版史上第一個受外資捐助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日本學人稱譽《學人》“是歷來諸項日中學術合作計劃中質量最高的”。^⑥但就期刊歷史認識而言，認定等級無助於認識的深化，^⑦與某些期刊比較也因性質不同、內容範圍有異而難有定論。^⑧有學者認為“《學人》最大的成績是：在一個鬱悶和壓抑的時期裡，它為許多有志於學術工作的中青年學者提供了空間，也為這一代學人的成長提供了園地”，^⑨肯定了它作為學術期刊的一般功能，卻未揭示《學人》思想和價值的獨特性。其突破在於主編自組織學術期刊，啟動學術集刊以示範公共學術空間。《學人》突破後的事功和影響集中在學術史——以“學術史研究筆談”專欄首倡學術史研究，辨析並力推學術創新與知識生產的累積性增長。《學人》就這樣站在學術史和期刊史的交匯點。學術期刊首先屬於學術共同體，其歷史功績與地位高下決定於該刊開拓、推進相應專業領域知識生產累積增長的深淺、厚薄、寬窄、疏密乃至有無。這是考察包括學術集刊在內的學術期刊的基本邏輯。學術集刊中的佼佼者，其學術史地位一般會高於期刊史地位。

《學人》一直無輔文言及發刊宗旨。第1輯以共計11人的“學術史研究筆談”隆重啟卷，“象徵地表明這本雜誌的發刊宗旨”。^⑩《學人》第1、2、4、5、7、10、13輯均以顯著位置推出“學術史研究筆談”專欄，共發表文章35篇。《學人》15輯共發表文章327篇，“學術史研究筆談”篇目數僅1/10強，頻率達7/15，可見推崇與注重。此前學術期刊中，沒有一個如此持續倡導學術史研究。既矯1980年代學術研究空疏之弊，更倡考鏡源流，使學術成為繼往開來的知識累積和遞增。這恰是後來持續20餘年的學術規範化運動的先聲。

陳平原在第一輯《學術史研究隨想》中說：“學術史對於建立學術權威，顯示學術規範，使得整個學界有所敬畏，有所依循，不至於‘肆無忌憚’，還是大有好處的。”編輯初衷溢於言表。據《學人》第一輯卷首“編者按”，這組筆談源於1991年1月18日的“學術聚會，專門討論學術史研究的發展前景”，發言整理成文便是學術史筆談的由來。蔣寅、許明聞訊加盟，所撰《學術史研究與學術規範化》、《研究邏輯·學術規範·知識增長》，恰是後來學術規範化討論的關鍵詞與主題句。《學人》因銘刻“筆談”，兼記聚會、發源“討論”而形成學術史、期刊史雙流並匯。後來有人將學術集刊稱為“獨立知識人刊物”，^⑪彰顯了學術集刊內在的思想品格，飽含學人願景。

（三）總體生態平衡價值與個體學術思想價值的辨析

學術集刊的價值認定，應當將以類為單位的總體評價與以種為單位的個體評價區分開來。它品種繁多，質量良莠不齊，只能充分肯定它的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生態的平衡價值，不宜無保留地同步肯定所有學術集刊的思想學術價值。期刊的生態平衡價值和思想學術價值是兩種不同的價值形態。個體評價只能針對具體集刊而具體分析——將該集刊置於相應的思想、學術領域中予以專業化專門化視角的批判。對象意義上的學術、專業領域，工具意義上的思想、學術方法，編輯者專題策劃的思想力度、到位程度等都是具體考量的重要維度。

在學術集刊中，確有少量佼佼者對 40 年的學術發展、思想引領效果顯著，必將或深或淺地載入改革開放學術期刊史。如王元化主編的《學術集林》（共 17 卷）、樂黛雲主編的《跨文化對話》（已出 37 輯）、劉東主編的《中國學術》（共出 40 輯）等已成為相關專門學術領域的重鎮。吳敬璉主編的《比較》更讓人驚歎，本人主編《共和國期刊 60 年》時將其作為典型代表悄然收錄。《比較》創刊於 2002 年，由中信出版社連續出版 96 期。其宗旨為“以比較傳遞理念、思想和知識”。它站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前沿，接納海外智庫的洞見，發表厚實切要的經濟研究論文，價值獨特、個性鮮明。該刊由郭樹清、樓繼偉、周小川等 16 位著名經濟學家任編委，對外聯繫為數甚多的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為代表的世界頂級作者隊伍，對內建構並維繫與中國學術高層、政策制定高層的緊密交往，從而敏銳、精準地抓住中國改革實際的關鍵問題，改革思想與經濟問題高度融合，在 21 世紀中國社科學術界創造了權威性和學術媒體的標杆意義。《比較》第一輯卷首語中說：“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比較》第一輯當然是新問世的，但學術界的朋友和許多讀者會看到編者的繼承性。”如果這裡暗示的是期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對《比較》的衍生關係，那《比較》的業績證明了學術集刊既在期刊體制之外又在出版合法性之內的超然性。其選題、學術探索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難以展開並達到的。

有人認為學術集刊“仍不失為晚近十年來中國內地學術文化界最為引人注目的革命性巨變之一，這一巨變的巨大學術文化遺產就是一向匱乏的中國公共學術空間的創立、建設及其試驗”。^②“革命性巨變”之說尚待質疑。在 1949 年以前，學界主體性較強，自主發展積極性高，同仁期刊很多，通過學術期刊創設學術共同體的佳話不少。如果承認這一歷史事實且拉長觀察時段，“革命性巨變”未必成立，僅表現為某種程度上的回歸與嚮往。如果將觀察時段限定在 1949 年以來，固然要認同學術集刊在思想、學術、文化中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抗爭以及拉鋸式的鬆動，但這並非制度安排，且潛存一定的不確定性。肯定學術集刊的生態平衡價值遠高於其他價值，是指（1）在中國人文社科學術生態的層面認識其自組織、自適應的動態平衡功能，（2）以其自組織、自適應的期刊生命過程為鏡子，認識高校社科學報等另三類學術期刊的進退得失。

學術集刊某種程度上表明期刊審批制度的僵化。中國期刊的審批管理長期固守總量控制，刊號供給嚴重短缺，學人的辦刊需求只能部分壓抑，部分消解，部分轉移到以書代刊，以尋求替代性滿足。因此，學術集刊作為辦刊需求壓抑或轉移後的“苦菜花”，折射著期刊審批制度的某些缺陷。

學術集刊的內容結構方式與高校學報的論文集模式形成對照。源於學科分化的世界性潮流，邊緣學科、交叉研究層出不窮，以問題為導向組織專題性專門性探索成為常態。學術界因此要求高校社科學報由服務本校走向開放，綜合性學術期刊大幅度壓縮總體佔比轉型成為專業刊，以更有效地服務越來越專業化的學術群體。但高校社科學報因為主辦制度的體制性鉗制而無法完成這一結構性轉型，從而導致學界與刊界由疏離走向訣別。舉措之一是學人整合資源，自主創辦學術集刊。如賀衛方擔任主編的《中外法學》，“經常編輯一些專號，一期全部是關於一個問題的”，這種以問題或專題為核心的編輯取向，“大學學報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這樣的刊物也很難做到這樣的事情，因為如果你把所有的篇幅都給一個學科的作者的話，就沒有辦法去照顧別人”。^③“有些集刊只研究某一特定學科，有些是以某一問題、主題為中心來組織的，比如我們的《文化研究》。研究領域的相對集中使得集刊較之一般刊物而言更專業。”^④就此而言，學術集刊既追求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學術邏輯而不是權力審批邏輯上的自主性），又表達對綜

合性學術期刊的哀怨。它像一面鏡子，映現出中國社科學術期刊審批制度的僵化，社科學術期刊功能弱化。因為審批制度的硬約束，學術集刊總體的全面發展幾無可能，其中優異個體也面臨艱難選擇：要麼犧牲某種自由度和相對的自主性，而被收編、擁有刊號，納入常規期刊管理而連帶獲得政府資源；要麼享受期刊體制之外的自由度和自主性而自籌資源艱難發展。就此而言，學術集刊作為一隻永遠也長不大的“醜小鴨”，無力完全修補整個體系，只能部分替代社科學術期刊功能弱化。學術集刊總體性生態平衡價值集中在這裡。

二、高校社科學報：刊號系列設置及影響

筆者在編撰《共和國期刊 60 年》後發現，“在一個 60 年的時段和期刊生態系統中整體觀照高校社科學報，其超穩定的類群特徵鮮明突出”。^⑬寫作《中國期刊史》第 4 卷（1978～2015）又認識到，高校社科學報是改革開放期刊史上規模最大而又飽受學界詬病的類群，且沒有哪一類期刊像高校社科學報那樣得到了事無巨細的充分言說。反思 40 年學術期刊史，難以迴避高校社科學報，反思高校社科學報歷史，首先要直面其飽受詬病的內在因由。其超穩定的類群特徵與它飽受爭議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假定這因果關係存在，其超穩定的形成及維護機制又是什麼？為何在如此社會巨變、高校大躍進的背景下，它依然能維持超穩定？由波尋源，應當將 1998 年新聞出版署建立高校學報刊號系列作為重要的期刊事件，來探討其總體性結構性影響。

1998 年建立高校學報類刊號系列的背景如後：一、由於歷史原因，此前在全國範圍存在一大批內部期刊：“指不通過郵局徵訂，不在社會上出售，只在本系統或一定範圍內下發、交換的刊物。”^⑭全國地方高校學報大多屬於此列。二、1986 年起，開始有“內刊改正式期刊”。^⑮三、按照中央規定，“全國現有內部期刊將轉化為內部資料，高校內部學報也必須按這一規定轉化為內部資料。考慮調整全國期刊結構的需要和我國尚有少數高校沒有正式學報的實際情況，經中央宣傳部同意，決定建立普通高等學校學報類期刊刊號系列”，“列入高校學報類期刊刊號系列的高校學報，不計入期刊治理的壓縮指標及新辦期刊指標。”^⑯可見，這是為了控制期刊總量而又滿足高校主辦學報要求的變通性措施。看似簡單快捷地造福高校學報，實際複雜且影響深遠，積極的期刊管理政策因為相對嚴苛的約束條件、糾錯機制欠完善而產生了消極效果。

1998 年 2 月同時建立了高校學報刊號系列和信息參考類刊號系列，“信息參考類期刊，是指以刊登不宜公開宣傳的以信息為主的供領導及有關部門參閱的期刊”，“從嚴限定發行範圍”，有極強的內部性。高校學報以學術成果全面、充分交流為目的，外部性強，偏偏就其內容和刊名重新規定為：“學報刊登的稿件，2/3 以上是本校學術、科研論文或信息”，“學報名稱應冠以學校全稱”。^⑰2001 年《關於進一步調整高校學報結構的通知》繼續強調：“所有高校學報必須在‘學報’前冠以學校全稱，不得使用學校的簡稱。”^⑱規定細嚴過苛就是其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的由來。它以政府力量強力束縛了高校社科學報的後續發展，尤其是重點高校高端人文社科學報的發展。茲舉一例，1915 年是中國期刊第二個百年的起始年，標誌著中國民族期刊的興起。1915 年創辦了《青年雜誌》（1916 年更名《新青年》）、《科學》、《清華學報》和《船山學報》等。《科學》依然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船山學報》1990 年更名《船山學刊》也在出版。有此淵源，再加上《復旦學報》、《南開學報》的刊名簡稱，《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也想高舉“清華學報”大旗繼往開來。偏因“不得使用學校的簡稱”而難以更名。21 世紀異軍突起的“清華學報”因此難續百年刊史。活生生的百年老刊就如此只剩刊壇佳話。

建立高校學報類刊號系列的顯性直接影響之一是，高校學報規模爆發式增長。依據《新聞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98年、1999年）批文的初步統計，1998年新聞出版署發文106次，批准611種內部學報轉為學報類正式期刊，發文3次，批准14家學報創刊，其中10家為教育部直屬的理工類名校創辦學報社科版。1999年發文5次，批准34家內部學報轉為學報類正式期刊，發文40次共批准76種學報創刊。這兩年共增學報735種，^①且絕大部分為社科學報。以中國高校社科學報總體規模1,300種計，1/2強的學報在1998、1999年才獲得合法的學報身份。

建立高校學報類刊號系列的隱性間接影響是改寫了“學報”的常識性定義和基本功能。學報的本質是學術性，其基本功能是通過刊發前沿學術性論文來推進知識的累積性增長，進而推進人類認識進步。而1998、1999年新批的700多種學報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成人高校（包括教育學院、管理幹部學院、職工高等學校、農民高等學校、獨立的業餘大學和廣播電視大學等）”辦的“學報”。^②較典型的如《山東幹部函授大學學報》（山東幹部函授大學主辦）、《北京宣武紅旗業餘大學學報》（北京宣武紅旗業餘大學主辦）、《北京西城職大學報》（北京市西城職大主辦）。^③筆者並不反對這些高校根據需要創辦期刊，而是質疑這批期刊一律以“學報”命名。賦予這批內部期刊合法的正式期刊身份與將它們合法性地認定為“學報”是兩個概念。前者的核心是行政賦權，在行政許可的範圍內應該作為；後者的核心是社會賦能或者說學術賦能，應充分考量所辦“學報”與其主辦高校之間的媒介關係。高校有學科定位和功能定位差異，有生產前沿新知識與傳授已有舊知識的功能差異，學報與期刊、學報與專業期刊、學報與專業性學術期刊有不同內涵。高校學科發展中最缺專業期刊和專業性學術期刊，如允許發展後兩類期刊，學術期刊界將是另外的景觀和品格。不加區分地大規模批准“學報”，實際成為資源配置錯位，對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也損害了學報應有的學術聲譽。這可能是缺乏出版法規範制約的出版管理行為失範之舉。曾有媒體報道過“高校學報尷尬難看的現狀：目前初步認定的2,700種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中，竟有約500種學術期刊在7年中沒有被引用一次”。^④這顯然有違當初批量發放這批刊號的初衷。

建立高校學報類刊號系列及後續制度安排，關閉了高校社科學報向專業性學術期刊的轉型路徑。綜合性學報難以滿足專業人士、專業團體的學術需求，前沿學者偏愛內容專門、主題集中的專業性學術期刊，此為學界、學術期刊界常識。1980年代以來，一些有識之士一直謀求摒棄“學報”套路，創辦專業性學術期刊。高校學報刊號系列設置後，此前本來是正式期刊的高校社科學報也被“一刀切”，在高校合併重組中難以用原刊號資源另外創辦專業刊，前堵後截，高校社科學報便滯脹為種數最大、詬病最多的類群。2000年，原廣州師院、華南建設學院、廣州大學、廣州教育學院等9所學校合併成新廣州大學。合校前，《廣州師院學報》（綜合版）、《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華南建設學院學報》、《廣州教育學院學報》等4個公開發行學報都擁有國內統一刊號和國際標準刊號。伴隨合校的合刊過程中，有編輯建議“將其中兩個改為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與自然科學版；另兩個學報改為兩個專業學術期刊，一個名為《華南建設》，另一個名為《廣州教育科學研究》”。^⑤堪稱充分調查新建廣州大學優勢學科資源後的建設性積極建議，惜未被採納。2001年4月，新聞出版總署《關於進一步調整高校學報結構的通知》中要求說：“為促進高校學術的發展和全國學術期刊整體質量的提高，對教育部直屬院校中的國內外知名的優勢學科，即屬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或‘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領域，或已獲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一級學科學位授予權的相應學科，可適當

發展高校專業性學術期刊。審批程序是：創辦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性期刊，由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報新聞出版總署審批；自然科學類學術期刊由教育部報國家科學技術部審核，新聞出版總署批准。”^⑥“高校專業性學術期刊”第一次寫入出版管理文件。2001年9月，新聞出版總署在《關於同意教育部所屬高校期刊調整意見的函》指出，“創辦國家重點大學社科類專業性學術期刊的問題，待與中宣部協商後再予答覆”。此函為新聞出版總署對教育部社政函（2001）20號的答覆。據此推斷（一）新聞出版總署曾想啟動糾錯機制，惜啟而未動；（二）教育部及時積極地回應了“可適當發展高校專業性學術期刊”，具體落實遇阻，高校專業性學術期刊結構性轉型便功敗垂成，讓歷史駐足沉思，扼腕歎息。

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對高校學報實行一校一刊的平均主義的普惠政策，而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則集中優勢資源建“985高校”、“211高校”，“雙一流”高校，重點高校重點學科建設與高端人文社科學術專業性期刊不配套對應，人為製造了重點高校優勢資源高投入多投入與人文社科學術成果低產出少產出的矛盾。^⑦重點高校自然科學也有這種結構性矛盾，但並未公開化、社會化，因為科技論文鼓勵也可以國外發表，科技論文發表後又作為學術資源由國家財政購回，發表轉移與巨額財政支付掩蓋、消解了這一矛盾。人文社會科學有地域性，國外發表園地有限，建構類似於高質量科技論文那樣的全球出版路徑幾無可能。因此，高校社科學報所彙集的論文發表、學科發展的矛盾長期存在，且愈演愈烈，波及越來越廣，越來越深。高校社科學報以及相關聯的中國人文社科綜合性期刊演變成為學界和社會兩不滿意的類群。

三、學術規範化運動：創新與試錯

1990年代興起的學術規範化討論是中國當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事件。有學者認為，它從討論發展為運動，從初期到“第二階段”儘管有逆轉甚至有倒錯，而在“第三階段”則更顯停滯，仍應肯定這是改革開放後一代學人的共同嚮往與集體行動，是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記錄。它包羅宏富，涉獵廣泛，經驗、教訓都充滿創新與試錯的價值內涵，值得以學術期刊為中心更深入、全面地清理研究。總結歷史無法迴避這一存在，開拓未來也必須從此汲取思想能量。

有人稱該討論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的一次知識性革命”，^⑧“它實際上是在社會和學術雙重轉型和變革的時代環境下新舊中西衝突和學術範式轉換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諸學科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識”。^⑨如何歷史地認識這一運動與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關係？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也同步“開始走向成熟”嗎？本節試圖提出問題並初步做出回答。

（一）學術規範化運動的分析方法

以學術期刊為中心的學術規範化討論的歷史分析首先應該明確一個理論前提：“學術刊物在引領學術規範方面處於一種特殊的、極重要的地位。”^⑩進而在此基礎上展開“學術期刊—學術規範—學術共同體—政府”的四維張力關係解析。在多篇評述、解析學術規範化討論的文獻中，周祥森的分析最顯歷史深度和學術規範的主題集中度，但分析框架的缺項、欠完備制約了他總體性解析的更深入拓展。在理想狀態下，學術期刊—學術規範—學術共同體的三角形關係圓滿而穩定，但三角形關係的分析模型忽視中國現實，更無法解釋學術規範化討論進程中實際發生了，而依此分析模型又被裁剪下來且並非冗餘的歷史事實。以前述四維張力關係審視學術規範化討論的時間進程與空間結構，不難發現四邊形扭曲為不規則的菱形，失衡的不對等的張力、矛盾恰是以學術期刊為中心的學術規範化運動低效的學術現實及根源。

歷時 26 年的學術規範化討論的特點是，“重在行動：整飭學術規範，打擊學術腐敗的具體措施”。^①“重在行動”是審視學術規範化討論以及後來的運動的基本視角和方法。也就是說，在前述四維張力圖示中，對學術期刊、學術共同體、政府都要一一考量其是否“重在行動”，而不能僅僅流連於對個體學人有關學術規範言說的思想描述以及價值考量。2004 年，鄧正來在《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文選》初版序言《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邁向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的第二階段》中，改稱“中國學術規範化運動”，並提出“學術共同體還就學術規範化的問題採取了一些聯合性的行動”“中國學術規範化運動第二階段的使命”等，以“運動”為關鍵詞的話語，相對於 1995 年他發表在《中國書評》上的《化解整體的社會科學觀——“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的討論》，有明顯的思想飛躍，充分表徵了學術規範化討論的認知進步和從言說到行動、從理論到實踐的策略轉移。其話語轉換未必引起了當時討論者和後來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值得在組織者思想觀念和參與人實踐的雙重意義上予以認同。

學術規範化討論發展到運動有一個歷史過程，而其從討論到運動的升級表明認識的深化，也具體反映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變遷。討論矛頭指向 1980 年代以來人文社科學界的失序、失範、失控，學界通常認為，討論正式啓動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和《中國書評》1994 年在北京舉辦的以“社會科學的規範化與本土化”為題的學術討論會。自 1995 年 1 月起，《中國書評》開闢“社會科學規範化與本土化討論”專欄，每期發表二至四篇不等的討論文章，是討論前期最給力的期刊之一。有學者認為“‘《學人》三君子’陳平原、汪暉和王守常就是經由‘學術史’的討論而積極啟動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②至於周祥森主張“其發端，並非始自 1991 年陳平原先生主編的《學人》叢刊的創辦”，而是《音樂研究》1988 年第 4 期發表楊沐的《我國音樂學術論文寫作中的一些問題》，^③筆者主張把個體性的思想觀念源起與群體性的討論活動區別開來，因而不贊成把討論追溯到楊文發表的 1988 年。討論接力於 1998 年 9 月《世界歷史》雜誌社和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遵循學術規範，加強學風建設，發展世界史學科”專題研討會；轉折於 1999 年 1 月新聞出版署音像司發文推行《〈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試行）》（簡稱 CAJ-CD 規範）、全國文科學報研究會再修訂頒發《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以 1999 年 3 月《中國社會科學》舉辦‘學術對話與學術規範’為標誌，學術規範終於進入中國學界的主流話語系統。”^④從 1999 年開始，CAJ-CD 規範成為從規範化討論到規範化運動轉折的新焦點，由學術規範的思想文化交鋒轉移到技術規範的標準制定與實施得失權衡，肯定與否定的交鋒激烈，高校學報界大力推行和社科院系統期刊斷然拒絕，學術期刊由此分化為兩大陣容，不難理解卻引人深思。2002 年，教育部制定並發佈《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2004 年，教育部發佈《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除“總則”和“附錄”外，有“基本規範”、“學術引文規範”、“學術成果規範”、“學術評價規範”和“學術批評規範”五部分，惜缺實施細則和懲處條例，因而約束力有限，更不構成威懾力。2007 年 8 月，以全國 15 家綜合性社科學報聯合發佈《關於修改編排規範的聯合啟事》為標誌，實際宣告了學術規範化運動結束。

（二）編排規範的試錯與糾錯

1999 年 1 月 12 日新聞出版署以“新出音（1999）17 號”發出“關於印發《〈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試行）》的通知”，該通知印發的《CAJ-CD B/T1-1998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從 1999 年 2 月 1 日試行。這個在全國學術期刊範

圍內普遍推廣的規範由音像司簽發並不是由新聞出版署報刊司簽發或聯合簽發，不能不感歎其意味深長。同在 1999 年，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根據 CAJ-CD 規範重新修訂頒發了《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範》，被越來越多的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採用。學術規範化討論因集中到編排技術規範的執行與討論而進入新階段。CAJ-CD 規範的本質是“檢索與評價數據規範”，趁學術規範化討論之機，借助政府和行業組織的力量，強行植入^⑤高校人文社科學報，在收編學報佔住陣地後，規範制訂者又由數據庫運營商轉換成學術評價者，學術規範化從討論到運動因陡增傳播技術及其裹挾的學術評價而更趨複雜，其中的偶然與必然、時點與時段、技術與人文、學術規範與學術評價、學術評價與期刊評價因此呈現多維度多層面的錯綜複雜。因此，學術規範化運動生動見證並深刻改寫了 21 世紀中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進程乃至方向。

CAJ-CD 規範“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結構性缺陷和極為低級的技术性缺陷”^⑥而受到諸多學報編輯部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系統期刊的抵制。1999 年 12 月，《世界歷史》、《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七刊編輯部發佈《關於遵守學術規範的聯合聲明》：“七刊編輯部將在 2000 年內發佈統一的歷史學論文寫作與刊載出版的技術規範，屆時七刊編輯部將提出統一的有關要求和規定；在此之前，請投稿者遵循各刊編輯部規定的寫作技術規範。”七刊編輯部聯合行動，“希望能制定一種被史學界多數人接受的比較權威的‘史學論文引證標注方式’”，^⑦簡稱“七刊規範”。其目的是“加強學術規範”，“編輯一本中國學術界通用學術手冊”，“如可稱《中國學術寫作及編輯出版手冊》”，^⑧其雄心與擔當堪稱學術規範化討論的成果之一。

2007 年 8 月，《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辦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範研討會。會後《北京大學學報》等 15 家學報聯合發佈了《關於修改編排規範的聯合啟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6 期以“本刊特稿”推出《為了共同的學術事業——“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範研討會”發言集萃》。《關於修改編排規範的聯合啟事》指出：“近十年來，高校學報直接將文獻部門制定的數據評價規範作為編排規範，弊端日漸顯露，突出地體現在文獻引證體例上，不僅學科之間的差異未得到應有的尊重，而且與各學科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慣例相衝突，從而造成了學者寫作、編者編輯、讀者閱讀的多重困難。這種局面的形成有著多方面複雜的原因，但該規範對學科差異的忽視、對學者本位的漠視和對評價指標的熱衷是主要原因。”“本著充分尊重學科差異、優先為科研服務、兼顧學術評價的原則，會議討論了新的規範文本《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範》，並決定在簽署本聯合啟事的各期刊試行。”^⑨CAJ-CD 規範的得失正誤自導入起就一直是激烈爭辯的問題，至此終於劃上了句號。此舉標誌著歷時 20 餘年的學術規範化運動總算有一個稍圓滿的收束。許紀霖在《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知識的生產與流通》一文指出：“隨著國家對學術規範的介入，規範化逐漸異化為形式化，即學術研究成果的注釋、格式、引用等各種形式化的要求。”^⑩15 家學報不盲從，敢於在全國學報界結構性試錯後領頭糾錯，對全國社科學術期刊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如有學人學刊再舉旗幟，以建構中國版《芝加哥手冊》為目標，重啟學術規範化運動的第二征程，則是學界幸事，也是中國學術史和學術期刊史的使命與責任。

在學術規範化運動中，鄧正來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時推行匿名評審，得到全國學術期刊界仿效，多少提高了學術期刊的文稿質量。後在 1994 年主編的《中國書評》以“提升中國社會科學，確立學術評價體系，嚴格學術規範要求”為宗旨，不遺餘力地開展“主題書評”活

動。學術評價觀念由此濫觴於學術界。梳理學術規範化運動的歷史後發現，學術評價的起點與本質是學術共同體的自我規範；學術評價逆轉的節點在推廣 CAJ-CD 規範，從觀念到實踐的學術評價及其指標設置、體系建構便鋪展開來並走向反面。提倡者初衷和參與討論者的基本共識是，學術評價遵循且踐行學術共同體的學術規範，目的在促成知識生產的有效、累積增長以“提升中國社會科學”。手段與目的，評價主體與評價對象清楚明瞭。但意外結出的苦果是學術評價異化：評價對象由學術專著、學術論文轉換到刊載學術論文的期刊，評價主體由包括學術期刊在內的學術共同體外化為文獻情報學“他者”。異化的學術評價因學科理性缺失、標準武斷而消解了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主體性、貶抑了編輯的創造性，負面效果凸顯，學術史、學術期刊史大有偏離原有航道之態勢。“在一個市場經濟時代，在中國已經加入到 WTO 的今天，仍然在學術領域中採取計劃經濟的作法，強制推行一種本來應該由學術‘市場’優勝劣汰規律所決定的規範，實在是與現實背道而馳。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作法包含著非常可怕的意蘊。如果一所大學居然不能決定自己學報採取何種注釋標準，你還能談什麼學術自由？如果大學的地位如此卑微，你還能創什麼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大學？”^④出語固然憤激，但洞穿現象直抵本質，因此發人深省。

從 1980 年代末以來學術失範的現實問題到 1990 年代學術規範化討論前期的學術論題，學術期刊在其中扮演著組織專題、提供發表園地、建構話語空間的媒介角色。在後期從討論到運動的深化過程中，學術期刊基於討論形成的共識，制訂引證、編排規範，從規範求解者積極轉身為規範制訂者、執行者，象徵了學術規範化運動的實績和水平。如果說，學術規範化運動代表了中國人文社科學術走向成熟，那麼，中國社科學術期刊在伴隨、推進這一走向成熟的歷史過程中，積極作為、糾偏有效，因此值得讚許。

四、開放視角下的名刊工程

在改革開放期刊史上，曾出現 5 個期刊工程：社刊工程、署刊工程、百刊工程、名刊工程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前三者由新聞出版署 1999 年倡議建設並組織實施，分別指向出版社主辦期刊、新聞出版署主辦期刊和 1998、2000 年評選出來的第一、二屆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刊與全國百種重點科技期刊。署刊工程、百刊工程幾無後續建設措施。2000 年，“為了支援‘社刊工程’，在這次根據中央精神進行報刊結構佈局調整中，劃入出版社的期刊就有 160 多種，實施‘社刊工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④因為多方面原因，社刊工程成效亦不顯著（此處不展開）。名刊工程創意源於前述三刊工程，教育部 2002 年倡議建設，歷時 14 年，有人曾對名刊工程入選學報做過細緻、專業的分析，^⑤實證了它對入選學報的正向激勵，且成效較為顯著。

“名刊工程”在 2003 年、2006 年、2011 年三次評選“名刊”31 種，2004、2011、2016 年三次評選“名欄”65 個。2012 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從全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中遴選 200 種每年資助 40 萬元，鼓勵受助期刊“努力建設成為國際知名或國內一流的學術期刊”。後依據《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管理辦法（暫行）》逐年考評，已連續支持 6 年。歷時性考察這 5 個工程，不難發現兩點：其一，就推動力度、持續時間、成效顯示度而言，名刊工程明顯超越了此前新聞出版署的“三刊工程”，財政支持從無到有尤其彰顯了經濟繁榮後的期刊大國有所不同的推進策略。其二，“無論是資助的規模和力度，持續的時間和產生的影響，教育部名刊工程都是無法和國家社科基金對期刊的資助相比的”。^⑥以此為起點，比對名刊工程和國家社科基金

資助期刊的理念異同將有助於建構政府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良性關係。

名刊工程是一個系統工程。“在‘名刊’之外，今後教育部還準備重點建設一批社科學報的‘名欄’（特色欄目和優秀欄目），評選一批在社科學報上刊發的‘名作’（優秀文章），以及在此基礎上發現和培養一批‘名家’（名主編、名編輯），使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刊物都能發揮自己的優勢，辦出自己的特色。”^{④5}因此，既應該看到名刊工程在實踐形態上的未完成性，也應該肯定它基於學術期刊內在規律而在建設理念上的系統性乃至先進性。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的行動享譽更高，值得稱道處不少，比如在期刊遴選、資金管理等方面制度安排更完善，受助期刊的學科結構更趨合理，完善的制度嚴格有效實施帶來制度績效等。改革開放期刊史應銘記的是，作為權威機構第一次明令禁止社科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且一旦發現嚴肅查處，這一正確導向嚴正表明了一個經濟大國、期刊大國發展學術期刊的基本態度，從而有效扭轉了中國人文社科前沿學術期刊的基本發展方向。名刊工程和國家社科基金都認同並鼓勵專欄創新，但國家社科基金支持學術期刊中的專題、專欄創新更顯自覺，也更有力度。在2017年考核合格的187家受助期刊中，“有16家期刊除獲得40萬元基礎經費外，還分別有10萬、20萬、30萬元的專項經費”。^{④6}《財經問題研究》2017年除繼續榮獲40萬元基礎經費資助外，“‘理論研究’欄目還獲得30萬元的專項經費資助。”^{④7}所以該為此類遵循學術期刊規律的切實促進舉措叫好。

反觀名刊工程後續階段沒有評選“名編輯”和“名文”，其結構性缺失留下深長的歷史遺憾。“名刊”指涉學術期刊品牌建設，“名欄”有助於推動新學科、潛學科建設，“名編”評選屬於學術期刊編輯隊伍建設，以確認身份的形式表彰資深，激勵後進。“名文”、“名欄”、“名編輯”和“名刊”合成名刊工程的系統結構。沒有“名欄”、“名文”，“名刊”就缺乏期刊文本依據；沒有“名編輯”專業化職業化的持續耕耘，“名文”、“名欄”、“名刊”更是無源之水。推選“名編輯”、“名文”，有識之士多有期盼，固然難度不小，但這兩個缺項不僅關乎“名刊工程”的總體質量，進而影響主辦者的社會形象，對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發展乃至整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都是結構性的。數字傳播、基於數據庫的學術傳播，已使論文脫離期刊而成為獨立的傳播單位，論文的思想學術單元價值更加放大了。當“名刊”不再成為一個傳播單位，名刊評選的價值就消解或被部分消解了。就數字時代學術期刊的發展而言，可以依靠且用以應對不確定性的唯有編輯——學術編輯對生產新知識的職業忠誠與專業能力。因此，“名編輯”的推選就不再是勞動模範、幕後英雄的簡單表彰，而具有了數字時代學術期刊發展的生命依託和希望寄託的象徵意義。就此而言，朱劍文章^{④8}論及的學術編輯的身份焦慮值得瞻前顧後地深遠關注。

五、結語與討論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社科學術期刊也伴隨改革開放創造了輝煌。其品種數量、出版規模等均創歷史新高，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以專題、專欄等多種形式積極參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貢獻巨大，影響深遠，名刊輩出，這是200年中國期刊史的榮光。一代改革開放學術期刊人的成長、成熟尤當為歷史銘記。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社科學術生態的變遷將越來越凸顯這一代改革開放社科學術期刊人的思想情懷和知識價值。

改革開放40年社科學術期刊史以學術規範化運動為主潮，其運動時長恰巧成為學術期刊發展變遷的關鍵時段。1998、1999兩年是改寫學術期刊歷史的焦點時刻，客觀地說，也是中國加入

WTO前夕滿懷全球化希望而奮發有為的年份。社科學術期刊在整體上獲得快速發展。學術集刊則異軍突起，維護了學術期刊的生態平衡。名刊工程理念先進前期績效顯著，開啟了政府遵循期刊規律以工程形式助推期刊可持續發展的良好開端。繼而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從理念到制度安排更趨完善，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頗顯21世紀社科學術期刊新氣象，也預示了中國社科學術期刊的未來。

審批制度、主管主辦制度和屬地管理制度是中國期刊管理的三大制度，因此，忽視政府維度的期刊類群研究無論如何都是殘缺的。本文所以聚焦於他人或有所忽略的現象、事件、變遷節點，意在揭示中國社科學術期刊當下的變遷境況，以期引起各界的關注。筆者也試圖打磨學術期刊—學術規範—學術共同體—政府四維互動的理論工具，以探索、揭示40年社科學術期刊的變遷節點、歷史軌跡及時代特徵。40年改革開放期刊歷史已經證明，學術期刊體制機制創新任重道遠，中國社科學術期刊在多方努力下一定會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①參見李頻：《中國期刊史》第四卷（1978—201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47頁。

②《刊訊》，北京：《讀書》，1979年第1期。

③《書訊：〈外國文學研究集刊〉出版》，武漢：《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2期。

④肖篤君：《不停頓的腳步——憶1984—1987年的編輯工作》，《學術信息第一家——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發展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8年，第238頁。

⑤王秀玲：《論學術集刊的獨特價值與發展路徑》，北京：《出版發行研究》，2017年第10期。

⑥⑩伊藤虎丸：《學術史的時代》，見《學人》第10輯，第1頁。

⑦“就總體學術水平而言，與國內現有的任何一家學術刊物相比，《學人》都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於最好的等級之列。”見楊玉聖：《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3頁。

⑧參見楊玉聖：《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第455頁。

⑨汪暉：《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紀〉與〈學人〉》，<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1164838>

⑪黃卓越：《規範的界說與思想的限度》，見鄧正來主編：《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文選》（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1頁。

⑫楊玉聖：《公共學術空間的建設——〈學人〉之路》，香港：《二十一世紀》，2000年6月號，轉引自楊玉聖：《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第455頁。

⑬賀衛方：《學術期刊的空間和方向》，見余三定主編：《當代學術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38頁。

⑭陶東風：《集刊出版“理想的婆家”》，見謝曙光主編：《我與社科文獻——30年的光榮與夢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8頁。

⑮李頻：《高校社科學報改革的關鍵和出路在於制度創新》，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⑯《全國性自然科學技術期刊管理辦法》，見國家出版局辦公室編：《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84～1985），北京：內部編印，1985年，第247頁。

⑰《關於審批部分期刊及“特許”內刊等問題的報告》中說：“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及各人民團體指導工作的期刊，大多數都以內刊出版，對其中一些有一定基礎，帶有行業特點及內容和形式等質量符合正式期刊要求的，可適當批准為正式期刊。”見國家出版局辦公室編：《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86～1987），北京：內部編印，1988年，第50頁。

⑱⑲新聞出版署：《關於建立高校學報類期刊刊號系列的通知》，見新聞出版署辦公室編：《新聞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98年），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0年，第276、278頁；第277頁。

⑳㉑新聞出版總署辦公廳編：《新聞出版工作文件選編》（2001年），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4年，第429頁。

㉒李保中在《1998年全國期刊工作簡述》（見《中國出版年鑒》1999年卷）中說當年“已批辦高校學報系列期刊512種”，有誤。

㉓《關於同意北京市創辦9種學報類期刊的批覆》，《新聞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98年），新聞出版

署辦公室編，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0年，第393～394頁。

②④馮雪梅：《製造垃圾的高校學報不如停刊》，北京：《中國青年報》，2013年4月11日。

②⑤劉少華：《試論合併高校學術期刊的辦刊模式》，北京：《中國科技期刊研究》，2001年第12期。

②⑥新聞出版總署：《關於進一步調整高校學報結構的通知》，見新聞出版總署辦公廳編：《新聞出版工作文件選編》（2001年），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4年，第429頁。

②⑦李頻、李瑞：《社科學術創新與社科學術期刊分佈之關係考察》，鄭州：《鄭州輕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②⑧②鄧正來：《序言：知識生產機器的反思與批判》，見鄧正來主編：《中國學術規範化討論文選》（修訂版），第3頁。

②⑨⑩③③周祥森：《新舊中西的衝突：大變革時期學術規範討論的思考》，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3年第10期。

③①胡揚：《整飭學術規範 反對學術腐敗——〈自然辯證法通訊〉“學術規範與學風建設”討論綜述》，湖南嶽陽：《雲夢學刊》，2003年第5期。

③④楊玉聖、張保生主編：《學術規範讀本》，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前言。

③⑤朱劍指出：“這些大多未做過社科期刊編輯和作者的評價人員，為了方便地獲取評價必需的數據，居然為社科期刊制訂了一整套的編排規範，並且能讓所有的高校學報和部分社科期刊在一片反對聲中執行了八年。”見朱劍：《顛倒關係的再顛倒——學術期刊編排規範與“評價權力”關係辨析》，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第17頁。楊煥章說，CAJ-CD規範試行“至今八年有餘，學報的編者、作者和讀者還是這樣的不理解、不熟悉、不掌握，我們確實應當反思現行的規範是否以人為本，是否有問題，是否需要改進”。見楊煥章：《進一步完善學報編輯規範需要注意

的幾個原則問題》，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第6頁。

③⑥④①任東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學術注釋規範》，石家莊：《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第9期。

③⑦王笛：《學術規範與學術批評》，廣州：《開放時代》，2001年第12期。

③⑧張亦工：《關於〈歷史研究〉的“引證標注方式”及相關問題》，石家莊：《社會科學論壇》，2002年第9期。

③⑨見《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封二。

④⑩見蘇力、陳春聲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603頁。

④⑪石峰：《“社刊工程”的喜與憂》，北京：《中國出版》，2000年第7期。

④⑫參見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④⑬朱劍、王文軍：《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的作用與前景——基於CSSCI數據的分析》，長春：《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7期。

④⑭《啟動高校名刊工程 打造社科期刊品牌》，北京：《中國教育報》，2004年2月25日。

④⑮《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期刊2017年度考核和專項資助情況通報》，<http://www.npocss-cn.gov.cn/n1/2017/1101/c219469-29619954.html>

④⑯《雜誌社參加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調研座談會》，http://www.dufe.edu.cn/content_15833.html

④⑰朱劍：《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1978—2017年學術期刊的一個側面》，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李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27

[責任編輯 劉澤生]